

六 獨尊儒術與士人政府

一代雄主漢武帝，繼位時才十六歲，就立志要做一番大事業。武帝下詔各郡縣，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的人士。風雲際會，當時應舉的董仲舒是位精通儒家學說的大學問家，卓有見地，他向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議。這就是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國策的最初由來。董仲舒正是其中的關鍵人物。儒家學說後來影響中國達數千年之久，成為思想的主流。



董仲舒畫像

獨尊儒術，出於政治需要

審時度世，獨尊儒術當然不會平地一聲雷就被定於一尊。漢初的無為而治，其實早已醞釀著政治危機，內有地方封國勢力坐大，外有匈奴不斷侵侮，漢武帝思欲有為，力圖扭轉時局，而儒家尊王攘夷、忠君愛國的思想正合需要。

更何況，漢初以黃老無為的思想為尚，以致諸子百家的思想

仍相當活躍，各持一端，極不利於大一統國家政權的鞏固。為了求得政治上的統一，必須先實行思想上的統一。

於是一系列措施相繼推出。拜儒生為相，改變漢初以功臣封侯拜相的慣例；京師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挑選品學端正、儀表清秀的子弟為博士弟子員，學習儒家經典，學而優者即可出仕。又把選舉定制，確立察舉制和徵辟制，薦舉地方郡國的孝子廉吏，徵聘有才德和名望的人士，加以任用。從而，中央至地方各級官吏漸由儒士充當，丞相亦多由儒士出任，實行以儒術治國。此等政權組織，史家稱之為「士人政府」。

以儒術治國，當初更多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武帝當年也許意料不到，儒家思想卻因此成為中國社會二千多年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說也因此而成為「一枝獨秀」的顯學，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政權開放，士人政府形成

到了唐宋時期，尤其到宋代時，中央政府的要職，固以士人擔任，地方上的官吏，亦以士人充當，甚至以「文人知軍事」，掌理軍機要務。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如果說漢武帝時期所謂的士人政府仍處於以儒家思想作指導來選拔士人的摸索階段的話，那麼，可以說宋代是士人政府真正成熟的時期。這時，士人的出身或貧或富對他們進入政府已不再造成任何障礙，平民子弟只要肯勤奮學習，同樣可以透過科舉考試，從布衣的身分一躍而成為官員，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誠非虛言。

因此，儘管漢代以來的政權體制本質上仍然脫離不了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僚治體」，但實際上，這個官僚體制並非封閉的，而是由一群有學問的儒士所壟斷的，而這些儒士是來自社會上各個階層的。

士人政府形成後，一般宗室貴族以及部分功臣只食祿而不理事，具體政務多由經選舉而來的官員處理，從而，政權的組織超越皇室私親關係，走上羅致全國人才共同治理國家之途。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早已開放了，任何人只要符

合法律上的規定條件與標準，都可進入政府。」「士」作為社會政治精英群體得到認同，因而在最大的程度上改變了皇帝既代表政權亦是治權之核心的格局。

文人主政，儒學弘揚

儒術定於一尊引致士人政府出現，而士人政府的形成又保證了儒術的發展。儒家的經典《詩》、《書》、《禮》、《易》、《春秋》一躍而成為政教經典。「學而優則仕」，讀書人最終目的在於入仕為官，而熟讀儒家經典則為必經之途。

從漢武帝開始，儒家政教大為推廣，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學習儒術者，蔚然成風，儒家忠孝節義、積極用世的思想深入人心。而且歷代從風，中央公卿及地方官吏，多為彬彬儒士，國家政權架構中的文化素養因而大大提高，文治加強，推動了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進步。

儘管近代許多評論者對「文人主政」的政策多有非議，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正好反映出儒士在社會架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以此觀之，一種以儒家思想為主調的知識型文化出現於古代中國，也就並非偶然了。



錢穆